

从个人志趣到学术探索

——《春秋繁露》英译史钩沉

吴雨轩¹ 徐云秋²

(1. 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 唐山 063210; 2. 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05)

摘要: 西汉“儒家宗”董仲舒结合阴阳学说重新阐发了儒家思想,使其成为中国社会思想的正统,《春秋繁露》集中反映了董学思想的精粹。该著作的英语译者以汉学家为主,译者对其学术探索逐渐超越个人志趣,董学研究专家的投入使译文更加呈现学术化的特征。作为典籍外译的一个缩影,《春秋繁露》英译史在翻译主体、翻译受众和翻译策略上为当下推进中国典籍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春秋繁露》; 董仲舒; 典籍; 英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24)06-0132-11

0 引言

西汉时期,“儒家宗”董仲舒根据国家统治需要结合阴阳五行学说重新阐发了儒家思想,“在儒学传统中开辟了新的宇宙观”(Pokorny, 2018: 354),使其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并延续至清末。董氏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从公羊学出发,兼纳阴阳五行学说,深度阐释了《春秋》中的儒家义理和文哲思想。《春秋繁露》成书夹叙夹议,内容丰富深厚,思想博大精深,是董氏儒学和经学思想的深刻反映。“西汉大师说经,此为第一书矣”(苏舆, 1996: 2),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春秋繁露》的英译较其他儒家经典发端较晚,最早见于20世纪40年代英文版中国哲学论著中的节译,直至新世纪以降才出现首个全译本,其译介不仅推动了董学思想在海外的传播,而且深刻影响了英语世界的多元文化建构。当前学界对该论著的英语译介有所关注,如吴龙灿(2015)、刘炜华(2019)、布莲(Buljan, 2020)等皆在宏观层面对其英译史予以简要概述,但以上学者失于进一步考察译文及译本的接受状况,进而难以深入刻画《春秋繁

收稿日期: 2023-12-10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董仲舒《春秋繁露》的英译与海外传播研究”(HB23YY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吴雨轩,男,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外译研究。

徐云秋,女,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文化外译研究。

引用格式: 吴雨轩,徐云秋.从个人志趣到学术探索——《春秋繁露》英译史钩沉[J].外国语文,2024(6):132-142.

• 132 •

露》英译本的全貌。译者是语言和文化转换的主要执行者(邵璐等,2024:127),基于此,本文在厘清《春秋繁露》英译历程的基础上,结合译者的文化身份考察不同译者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并通过相关评论探讨各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以此管窥董学在海外的传播历程。

1 修中诚的古典哲学视野

《春秋繁露》的英译始于英国学者修中诚(Hughes Ernest Richard, 1883—1956)的节译。修中诚毕生致力于推动中国古代文哲思想的海外传播,曾推出儒家经典《大学》和《中庸》的英文全译本。他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于1911年自伦敦漂洋过海抵达福建汀州并在此传教。其间,修氏辗转中国各地,与陈寅恪、王维诚等私交甚好,1933年重返牛津任教并建立了汉学院(Chinese Honor School)。1942年,登特桑斯出版社(J.M.Dent & Sons Ltd)发行了他晚年编译的《古典时期的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 in Classical Times*)。由于自身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志趣加之汉学家的文化身份,修氏得以站在时代前沿,按照胡适和冯友兰在新思潮影响下诠释哲学传统的方法,对中国先秦至两汉时期的重要哲学文献做了系统介绍,并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

修氏在编译这部著作时重点关注“能够就某些问题炳若观火,并在中国古典哲学史上处高临深的哲学大师”(Hughes, 1942: xxxvi),该书第八部分《三位汉代儒学大师》(*Three Han Confucianists Dogmatizing*)分别提到了董仲舒、班固和王充三人。在《董仲舒》一节,作者首先明确了董氏在汉朝及中国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他不仅综合先秦各家之长,建立了一种与当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儒家思想相异的新儒学,更辅佐汉武帝将儒学作为国教(state religion)进行推广以增强皇权(Hughes, 1942: 293)。在该节,修氏摘译了《春秋繁露》第42章《五行之义》、第23章《三代改制质文》、第35章《深察名号》、第57章《同类相动》和第64章《五行五事》等内容。从翻译选材来看,以上章节重点论述了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核心观点,包括重新定义五行顺序、君主受命于天、天赋善恶论以及君主德行与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等。修氏对以上章节的译介凸显了他意欲向西方读者介绍董仲舒的历史哲学观、人性论、阴阳五行说以及礼乐教化观的目的。

具体到文本层面,修氏有着强烈的读者观。他认为,汉语文言文干练简洁,蕴含深厚的文化背景知识,这对于两千年之后的异域读者而言显得“神秘莫测”(Hughes, 1942: xxxvii)。基于此,修氏通过文内括号标注的方式对译文进行了必要的解释性补充,以此保证在不误导读者的前提下辅助其更好地理解文本内容,从而努力排除目的语读者可能遇到的阅读障碍。

例1 原文: 禁天所禁,非禁天也。必知天性不乘于教,终不能枉。(《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译文: I affirm that if the self is like Heaven, prohibits what Heaven prohibits, and does not run counter to Heaven, it must be because it knows Heaven. (That is to say,) if the congenital nature does not take advantage of authoritative teaching [chiao], then it can never get a mat [i.e. a protective apparatus]. (Hughes, 1942: 301)

董仲舒借天人关系诠释其人性理论,在论证了“天有阴阳禁”之后,转而发问人应如何“不损其欲而辍其情以应天”,进而总结应对人性加以教化以“应天”。修氏在理解原文内容的基础上把握到文本的深层逻辑,用译语再现了原文的精神旨归。他在译文中用圆括号标注了原文没有的内容“*That is to say*”(“换言之”),该表达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将文内暗含的关联显化,以帮助读者迅速抓住本句的核心意义。在翻译“教”这一术语时,译者先直译,后加方括号用威妥玛拼音音译,如此一来,将中国文化中的“教”采用互文并置的方式,投射于中西两种文化背景之中,赋予其多元文化意义。最后,修氏采用隐喻的手法将“枉”译为“*get a mat*”,并在方括号内辅之以“*a protective apparatus*”(一种防护性工具)予以解释,原文意义具体化,易于读者理解。

修氏结合个人志趣精选了《春秋繁露》中其认为能完整展示董学思想的五章,并将其置于中国古典哲学的宏观叙事背景之中,为英语世界读者初步建构了一个具有神学化色彩的董子形象。他的译本受到了学界广泛好评。陈荣捷(Chan, 1943: 289-290)认为,此书最大的亮点在于译本选取的诸多章节之精妙,在当时对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2 狄培理等人的入门读物

20世纪50年代,受战后局势和冷战思维的影响,国际汉学研究中心逐渐转移至美国并获得了美国当局的有力支持。

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传统之本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一书,作为系统介绍中国文化的入门读本,该书由美国汉学家狄培理(Theodore William De Bary)、华兹生(Burton Watson)和华人学者陈荣捷三人共同编译,选材丰富多样,旨在帮助大众读者增强对中国文化背景的基本理解(De Bary et al., 1960: v)。《春秋繁露》的译文散落在该书多个章节中,如第七部分《帝国秩序》(the Imperial Order)包括《春秋繁露》第18章《离合根》、第19章《立元神》、第43章《阳尊阴卑》、第44章《王道通三》、第35章《深察名号》以及第30章《必仁且智》;第八部分“宇宙秩序”(the Universal Order)包括第58章《五行相生》以及第59章《五行相胜》。此外,第九部分《经济秩序》(The Economic Order)

还包含《汉书》中董仲舒关于土地改革的上疏。以上章节皆由华兹生负责。华氏在1956年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专攻中国和日本文学。他深厚的学术积淀造就了其翻译家与汉学家的双重身份,通过翻译与创作,他把多部中国历史与文学著作传播至英语世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华氏认为,《春秋繁露》和《淮南子》是西汉早期最重要的两本哲学著作,前者对汉代儒家理论的形成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De Bary et al., 1960: 157),而董氏则可称作继孟子和荀子之后的首位儒学大师(De Bary et al., 1960: 166),由此可见华氏对《春秋繁露》与董仲舒的推崇。正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志趣和对董氏的敬仰,他出色地完成了以上内容的译介。在该书的序言中,编者多次提及其预设的读者群体为大众读者(*general readers*),而非专业读者(*specialist*),因此译者一方面在译文中利用简洁易懂的词汇降低文本阅读难度,另一方面采取简短的小句精炼旨意,同时尽量减少注释,进而减轻读者的阅读负担。在此翻译观和读者观导向下,最终译文简明流畅,通俗易懂。

例2 原文: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译文: Now the nature of all people has this potential disposition, but it is not yet awakened; it is as though it were asleep and awaiting the wakening. If it receives education, it may afterwards become good. (De Bary et al., 1960: 167)

华兹生遵循其“尽力减少注释数量而译出更多内容”(Watson, 1982: 36)的翻译原则,选取现代英语中如“*potential disposition*”“*good*”等浅显易懂的词汇分别对应原文中“质”“善”等富有抽象意义的概念,精要地阐释了原文含义。此后,又使用“*but*”“*as though*”“*if*”等连接简单句,使原文隐含的逻辑信息得以显化。相比原文的艰涩难懂,译文通俗易懂,可读性强,迎合了大众读者的阅读偏好。

该书发行后引起了学界的热议。有学者认为,译者对董学思想的介绍恰如其分地解释了董学的宇宙论(Hummel, 1960: 169)。译文流畅易读,质量极高,只是对诸如“道”“无为”等一些专业术语的解释尚有不足,虽然可能是出于减轻普通读者阅读负担的目的,但可能会使其不知所云(Bodde, 1960: 254-255)。此外,也有学者认为,虽然译者声明该书的目标读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大众读者,并考虑到其认知语境和认知水平,在翻译策略上迎合了该读者群体的阅读习惯,但一些选材的内容对于他们而言可能十分枯燥乏味,例如“天人感应”这些概念就十分抽象晦涩(Dany, 1964: 364)。然而对于当时的学生而言,这是他们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可以接触到的最清晰易读的译文了,因此这本书也就成了他们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必读书目(Wright, 1961: 194)。

3 陈荣捷的课堂读本

《中国传统之本源》问世不久,196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荣捷编撰的《中国哲学文献编选》(*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后于1969年再版发行。陈氏长年在美,不仅研习、讲授中国儒学文化,而且翻译、出版过多本儒家经典,是一位译著等身的儒学大师,推动了新儒学在美国的发展和研究。1942年,他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任教时,该校尚未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他便写此书以“把中国哲学全盘托出”(陈荣捷,2018:1),用于学生课堂教材及专家研究参考。异域读者了解他国哲学的有效方式就是学习他国智力领袖(intellectual leaders)的言论著作,任何间接的描述或论断都是不可靠的,只有学习原文(即便是译文)才能准确理解哲学家们的思想(Chan,1969:vii)。因此,在本书中,陈氏以时间为轴,以人物为面,以经典论著为点,选取先秦到晚清的重要哲学家予以历时性介绍,并将他们的经典论著进行翻译,兼引各国学者的最新评论和研究成果,试图为读者系统呈现原汁原味、权威可靠的中国哲学。他用生动出色的英文为读者展示了其长期以来对中国思想传统的研究成果(Sih,1964:462),所选材料翻译相当准确(Holzman,1963:346)。

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推动了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同时,其哲学家身份也不应被世人忽视:董仲舒的重要哲学贡献在于他综合阴阳家和《易经》中的哲学观,阐明人与宇宙的关系:人是微观世界,自然是宏观世界,人是宇宙的缩影(Chan,1969:271)。基于此,陈氏认为董学是“阴阳式儒学”(Yin Yang Confucianism),并节译了《春秋繁露》中第35章《深察名号》、第42章《五行之义》、第56章《人副天数》和第57章《同类相动》等内容,向读者呈现了董仲舒的宇宙观和“天人感应”等论说。

典籍作品的思想性和辩证性使得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鸿沟(李德俊等,2021:108),一些含义复杂的中文术语很难在英文中找到对应的表达,因此陈氏选择了音译的方式,并尽力将使用频率保持在最低限度(Chan,1969:xi)。此外,陈氏还使用脚注对文内信息做解释和补充,在正文中使用方括号表示译文较原文增加的内容(extraneous material),使用圆括号进行说明和辨识(explanation and identification)(Chan,1969:xii)。值得一提的是,译者还在每节译文之后添加了“comment”,在正文中直接对具体段落进行解释和评论。这种个人评述在译文中相当频繁,精简凝练(Soper,1963:362),一方面能够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也能展示不同时期中国哲学流派间的相互联系。

例3 原文:必知天性不乘于教,终不能桎。察实以为名,无教之时,性何遽若是?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译文: We must know that without training our nature endowed by Heaven cannot in the final analysis make [the feelings and desires] weak. If we examine actuality to give names, when there has been no training, on what ground can nature be so called (as good) ?

Comment. It is absurd to draw conclusions on human nature from similarity in pronunciation of words...In saying that nature means what is inborn, he seems to be repeating Kao Tzu (c.420–c.350 B.C.) ...Tung's own theory is unique...His whole emphasis is on education. (Chan 1969: 274)

译者以局外人的身份在译文中直接插入自己的声音: 首先对译文进行了总结和评述, 而后通过董氏的论述联想到先秦时期的告子, 二人的思想形成呼应之势, 读者借此可理解不同时期中国哲学流派间思想的相继存续。以上翻译策略的运用大大提升了译文的学术性, 使该书成为国外专家学者、大学生和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之首选(Chan 1969: viii) 。当然, 这离不开陈氏个人长期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深入探索与钻研。

在当时被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中国哲学著作中, 陈氏的译本“内容最为全面、质量最为上乘”(Leslie, 1964: 263) , 西方读者借此得以深入系统地了解中国古典哲学。值得注意的是, 自陈氏译本起, 似乎《春秋繁露》的译者对原作的学术探索开始超越个人志趣, 甚至之后的译者都是董学研究专家, 他们逐渐将董仲舒从英语世界的中国古典哲学谱系中“剥离”出来, 形成专门针对董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此外, 他们愈来愈注重译文的学术性, 对读者群体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有力地推动着西方董学研究进一步深入, 这也促成了2015年《春秋繁露》首个全译本的问世。

4 桂思卓与梅杰的学术译本

陈氏译本发行后的50多年间, 国内外出版社皆未再出版涉及《春秋繁露》英译本的书。直至2016年,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发行了美国康涅狄格学院历史学教授桂思卓(Sarah A. Queen) 和达特茅斯学院东亚史教授和独立学者梅杰(John S. Major) 以刘殿爵的《春秋繁露逐字索引》为底本合译的《春秋繁露》(*Luxuriant Gem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首个英文全译本, 这也是迄今为止《春秋繁露》的首个外文全译本, 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Gentz, 2016: 213) , 将西方董学译介与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

两位译者都是著名的汉学家, 桂思卓(2010: 10) 更是美国汉学界董学研究大师, 早在1996年就出版了《从编年史到经典: 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From Chronicle to Canon: The Hermeneutic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ccording to Tung Chung-shu*) 一书, 在考证《春秋繁露》可信性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儒学在汉朝政治和法律实践中的作用以及儒学在汉朝时期

的宗教面相。由于译者是《春秋繁露》研究专家,该译本极富学术气息,编排体例完备,包括致谢、介绍、正文、附录、参考文献、索引等内容,仅介绍部分就长达35页,译者简要回顾了董仲舒的生平事迹,并对公羊学说、汉代儒学、译文编排以及翻译方法等作了详细说明。值得注意的是,受其历史学者身份的影响,译者对《春秋繁露》的真伪提出了质疑。之前几个译本的译者先验性地认为《春秋繁露》即是董仲舒本人所著,而桂氏和梅氏则认为这部各章节内容迥异的皇皇巨著似非董氏一人的赫赫之功,而应是几个时期、几代人共同的智慧结晶(Queen et al., 2016: 1)。因此,译本封面标注原文“归于董仲舒”(attributed to Dong Zhongshu),而未直接说明董仲舒即为原作者,可见译者学术态度之严谨。二人认为《春秋繁露》由生活在四至六世纪间的某个人将与董仲舒及公羊学派其他学者的思想相关的文章编纂而成(Queen et al., 2016: 17)。通过细读原文本,他们发现这位编纂者在汇编材料时遵循着一定的原则和逻辑,于是按照编纂者的汇编思路将原文各章节重新分为八编《解经编》(Exegetical Principles)、《帝王编》(Monarchical Principles)、《规制编》(Regulatory Principles)、《伦理编》(Ethical Principles)、《阴阳编》(Yin-Yang Principles)、《五行编》(Five-Phase Principles)、《礼制编》(Ritual Principles)和《天道编》(Heavenly Principles)^①,希望读者亦能理解编纂者的苦心经营,同时这种章节重组的方式也可提醒读者注意原著的碎片性和各章节的独立性(Queen et al., 2016: 17-20)。此外,译者还在每编译文正文前对编内各章节的成文时间和历史背景进行了语境溯源,并对章节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利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各编的核心要义。

在翻译方法上,二人汲取了早年合译《淮南子》的成功经验,力求采用标准、可读性强的英文再现原文内容(Queen et al., 2016: 30),翻译技艺精湛(Pokorny, 2018: 354)。桂氏前期对董学的深入研究以及二人合译《淮南子》的经验为英译《春秋繁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译者在必要时在译文中以脚注形式添加了刘殿爵编著的《春秋繁露逐字索引》以及瑞典汉学家马悦然(Goran Malmqvist)翻译的《春秋》和《公羊传》部分译文,各文本彼此互文,相互映射,为读者建构了一个多层次的汉学典籍阐释空间,丰富的注释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此外,对于原文未明确表述却隐含其中的内容,译者在正文中直接增补并置于方括号内,保证了语言转换后原语内容的完整性。如第七章《灭国上》中有一句“晋赵盾,一夫之士也……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译者译为“Zhao Dun of Jin was a lone knight...Thus, Wu Zixu [also] was a lone knight...”,显然译者注意到前后文的照应关系,保留了原文的句式,力求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表达风格。典籍的语义内容是其文化价值、历

^① 1996年出版的桂思卓《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中,作者桂思卓将《春秋繁露》分为解经编、黄老编、阴阳编、五行编和礼制编共五编,与该译著中的分类有所出入。

史价值等的体现(赵彦春等, 2016: 99), 译者的以上翻译策略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其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弘扬。

译本发行后, 英国汉学家、历史学家鲁惟一(Michael Loewe) 发表评论, 认为译者一方面在翻译前对原文内容进行解读; 另一方面在译文中添加注释对作者思想予以分析, 译本整体上质量比较可靠。不过, 鲁氏也指出了译文存在的问题, 如译者根据各章节的内容将其分门别类归于某一编的做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需要更多的证据加以支撑(Loewe, 2017: 322); 对于一些术语的翻译或参考文献的真实性有待考究, 例如, “中大夫”译为“grand master to the palace”会给读者一种该官职品阶极高的错误印象, 有悖于中国的历史事实等(Loewe, 2017: 327)。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亚洲研究系主任耿幽静教授(Joachim Gentz) 看来, 《春秋繁露》原本文的真实性与复杂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被翻译成西方语言的进程, 但该译本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完美的学术性译本(Gentz, 2016: 209)。首先, 译者的解释性介绍约占全书总篇幅的三分之一。其次, 译者借鉴《淮南子》的翻译方式, 把每一章分成若干小节加以区分标记后进行翻译, 对《春秋繁露》研究如此系统, 在历代学者中实属罕见, 这也为进一步探讨《春秋繁露》的成书历史和篇章结构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出发点(Gentz, 2016: 210)。由于原文属于哲学历史性质的论著, 其文字表述抽象晦涩, 需要读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 但译者总是在竭力保证译本清晰易懂。总之, 该译本遵循了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对中国经典作品一贯的翻译风格, 尽管原文冗长, 内容复杂, 但学术标准极高(Gentz, 2016: 213)。

5 布莲的全新尝试

2016年, 《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刊登了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印度与远东研究系教授布莲英译的《春秋繁露》第20章《保位权》。虽然布氏来自非英语国家, 但她的多篇英文学术成果都刊发在重要的国际核心期刊, 在英语世界乃至整个欧洲汉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布氏长期致力于儒学, 尤其是董学研究, 是一位董学研究专家。相比其他章节, 她对《保位权》有着更为深入的探索。例如, 2010年, 她曾在第16届欧洲汉学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会议上专门就《保位权》一章的语言特色和学理内容作了主旨发言; 2019年, 布氏再次发文, 认为《保位权》建构了一种自然主义的统治方式(Buljan, 2019: 289)。

布氏认为, 《春秋繁露》是理解中国儒学发展史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Buljan, 2016: 100)。在文中, 她回顾了《春秋繁露》的成书情况, 认为第18章至第20章皆在说明统治者的角色和统治手段(Buljan, 2016: 77), 之后又对“保位权”三个字作了详细解读。她追溯

至商鞅、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以阐释《保位权》蕴含的政治哲学,最后对该章进行了翻译并在文末附汉语原文,方便中英对照阅读。

虽然布氏只英译了《保位权》一章,但受其学者身份的影响,整篇译文呈现出典型的学术性特征。文章的前半部分旨在建构语境,译者在追问历史的基础上引导读者一步步走入这部巨著,为理解后半部分的译文奠定了基础。对于翻译方法,译者始终对典籍翻译保持谨慎的态度,对诸如“畏”“恶”等感情色彩浓厚的抽象词语采用直译加音译的方式。同时,她还为译文提供了丰富且详细的注释,数量高达80条,约占整个译文篇幅的二分之一。她大量援引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凌曙的《春秋繁露注》以及刘殿爵的《春秋繁露逐字索引》等古今多位董学研究大师的评注,从多个维度对文本进行阐释和解读以帮助读者深刻理解译文内容。

布氏基于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详细注释版的译文”(an annotated translation)(Buljan, 2016: 73),是桂氏和梅氏全译本之后的一次全新尝试。

6 启示

《春秋繁露》体大思精,集中反映了董仲舒的儒学思想。从翻译史学视野出发钩沉《春秋繁露》的英译历史,考察不同译者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研究发现,汉学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译者对其学术探索逐渐超越个人志趣,尤其是董学研究专家的投入使译文更加呈现学术化的特征。最终,虽然较其他儒家经典《春秋繁露》的英译发端较晚,却有一股“细水长流”的态势:自修中诚摘译该书至今已有近80年的时间,其间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两部包含《春秋繁露》章节的译著。21世纪以降,首个英文全译本的问世更是过去几十年间英语世界董学研究的结晶,发挥着启牖后学的作用。非英语国家学者的钻研与投入更为董学思想的世界经典提供了有益的个案参考。梳理《春秋繁露》的英译历史,探讨各译本的选材与翻译策略,可以弥补目前国内学界对海外董学研究关注之不足,帮助国内学者跨越国界限制,了解海外学者对该书中董学思想的理解与阐释以及异域读者对该论著的接受情况,具有重要的历史学与文献学意义。作为典籍外译的一个缩影,《春秋繁露》的英译史研究亦为当下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尤其是典籍译介提供了历史借鉴。

首先,就翻译主体而言,典籍翻译需要充分调动汉学家的积极性。汉学家既是汉学领域的研究者,又是该领域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在《春秋繁露》英译过程中,汉学家发挥了主要作用。他们对典籍的钻研与理解以及母语优势,使其能够遵从目的语表达规范,较为准确地向英语世界呈现中华典籍的思想精髓。

其次,在翻译受众上,译者要常怀读者意识。中国典籍翻译作品在海外传播效果不理

想的重要原因,是“译者当时心目中就没有考虑到真正的读者对象”(王宇弘等,2018:96)。译出的作品给谁看?大众读者还是研究学者?回顾《春秋繁露》英译史,多数译者都在序跋中提到了预设读者,并根据预设读者的认知特点等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这提醒我们,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时刻保持读者意识,注意根据不同目的语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最后,在翻译策略上,译者要善于组织设计副文本配合译文正文,充分发挥副文本的补充、说明、引导作用。《春秋繁露》各译本的译者都十分重视翻译之后译本的可理解性。区别于其他文学作品,典籍作品思想严肃,言简意深,文化含量高,因此在译介时,译者要善于借助译文正文之外的注释、解说、评论等对原文内容进行适当补充,尽量做到体例完备,注释详尽,术语一致。

文化“走出去”的第一步在翻译,而翻译是一种具有“不可能性的必要性”工作(德里达,2015:18),典籍翻译尤甚,因其“本质上是一种将中国文化典籍译成外国语言的一种翻译”(罗选民等,2020:88)。在推进典籍作品的国际传播过程中,要把握其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平衡,在传播民族之本的基础上推动典籍世界价值的实现。

参考文献:

- Bodde, D.1960. Reviewed Work: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J]. *Artibus Asiae* (23): 254-255.
- Buljan, I. 2016. “Bao wei quan” 保位權, Chapter 20 of *The Chunqiu Fanlu* 春秋繁露 [J].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1): 73-100.
- Buljan, I. 2019. Political Strategies for Maintaining Power: Power and Nature in Chapter 20 of *The Chunqiu Fanlu* [J]. *Asian Philosophy* (4): 289-305.
- Buljan, I. 2020. *The Chunqiu Fanlu: Research on the Text and Its First Complete Western (English) Translation* [J].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1): 1-25.
- Chan, W. T. 1943. Reviewed Work: *Chinese Philosophy in Classical Times*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4): 289-290.
- Chan, W. T. 1969.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any, L. L. 1964. Reviewed Work: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J]. *Philippine Studies* (2): 363-364.
- De Bary, T. W., B. Watson & W. T. Chan. 1960.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enz, J. 2016. Reviewed Work: *Luxuriant Gem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J].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38): 209-213.
- Holzman, D. 1963. Reviewed Work: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J]. *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 (9): 346.
- Hughes, E. R. 1942. *Chinese Philosophy in Classical Times* [M]. London: J.M. Dent & Sons Ltd.
- Hummel, W. A. 1960. Reviewed Work: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J].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 169-170.
- Leslie, D. 1964. Reviewed Work: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J]. *Toung Pao* (51): 263-269.

- Loewe, M. 2017. Review of *Luxuriant Gem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J].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 321-329.
- Pokorny, L. 2018. Review of *Luxuriant Gem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ttributed to Dong Zhongshu* [J]. *Religious Studies Review* (3): 354.
- Queen, S. A. & J. S. Major. 2016. *Luxuriant Gem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ih, K. T. P. 1964. Reviewed Work: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 461-463.
- Soper, A. 1963. Reviewed Work: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J]. *Artibus Asiae* (26): 361-362.
- Watson, B. 1982. Some Remarks on Early Chinese Historical Works [G] // G. Kao. *The Translation of Things Pas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F. A. 1961. Reviewed Work: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 194-195.
- 陈荣捷. 2018. 中国哲学文献选编 [M]. 杨儒宾, 吴有能, 朱荣贵, 等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德里达. 2015. 巴别塔 [G] // 陈永国, 编译. 翻译与后现代性.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桂思卓. 2010. 从编年史到经典: 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 [M]. 朱腾,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李德俊, 孙金华. 2021. 典籍的理解与翻译——来自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的启示与反思 [J]. *中国外语* (6): 101-109.
- 刘炜华. 2019. 走向西方学术界的董仲舒——西文董仲舒研究述评 [J]. *衡水学院学报* (2): 54-63.
- 罗选民, 李婕. 2020. 典籍翻译的内涵研究 [J]. *外语教学* (6): 83-88.
- 苏舆. 1996. 春秋繁露义证例言 [M]. 北京: 中华书局.
- 邵璐, 李伟超. 2024. 文本内外: 《钟鼓楼》英译传播多元行为者之“众声”研究 [J]. *外国语文* (4): 118-129.
- 王宇弘, 潘文国. 2018. 典籍翻译的道与器——潘文国教授访谈录 [J]. *中国外语* (5): 93-101.
- 吴龙灿. 2015. 董仲舒哲学研究百年 [J]. *衡水学院学报* (5): 27-33.
- 赵彦春, 吕丽荣. 2016. 中国典籍英译的偏向与本质的回归 [J]. *外国语文* (3): 95-100.

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History of *Chunqiu Fanlu*

WU Yuxuan XU Yunqiu

Abstract: Dong Zhongshu, master of Confucianism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explained Confuc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ing-yang school, making it the orthodox in Chinese social thought and the essence of Dong's thoughts can be found in *Chunqiu Fanlu*. This book is mainly translated by sinologists and the translators' academic exploration increasingly weight more than personal interests. In addition, translations of the book by experts in Dong's thoughts tend to be more academic. As a case of the trans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history of *Chunqiu Fanlu* also provides some references for current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 terms of translators, target reader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Chunqiu Fanlu*; Dong Zhongshu; classics; English translation

责任编辑: 陈宁